

§ 中国式现代化与高质量发展 §

地方政府考核目标转变的经济效率与福利效应研究

王文甫 方 也

摘 要: 构建一个合理且科学的考核体系,并引导地方政府更科学关注经济发展质量,是学术界亟须解决的重要问题之一。基于新开放宏观模型,通过构建一个包含地区竞争、市场分割及营商环境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从经济效率和经济福利两个维度来考察地方政府考核目标转变对经济发展质量的影响。研究发现:第一,传统考核机制会阻碍经济效率、经济福利水平的提升,地区竞争程度越大、市场分割程度越高、为优化营商环境努力程度越低,所引起的阻碍作用越明显;第二,在多元化考核机制下,地方政府短期目标导向能够缓解经济发展质量的负面影响,其中营商环境的优化有利于经济高质量的发展,但由于地区竞争与市场分割的存在,缓解作用并不能得到很好地释放。在经济高质量发展不断推进阶段,应尽快落实多元化考核机制,引导地方政府优化营商环境,并在一定程度上消除地区竞争与市场分割,以保证经济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 考核目标转变;地区竞争;市场分割;营商环境;经济效率与福利

中图分类号: F015; D63-3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6-0766 (2024) 03-0042-16

一、引 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一直保持着高速增长,建设成就卓越。但须认识到,中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而资源配置效率低下等问题制约了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在这些制约因素的背后,以 GDP 为核心的政绩考核无疑是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中国上级政府主要采取以 GDP 为核心的政绩考核机制对下级政府进行考核。地方官员为了在其任期内获得升迁机会,会将资本大量投入基建来促进短期经济增长,^① 使其仅关注经济增长数量的扩张而忽视经济增长质量。^② 然而,这造成了投资过量、挤出了公共服务支出,并带来了投资效率的下降,损害了民生福利。因此构建一个合理且科学的考核体系,并引导地方政府关注经济发展质量是学术界和政治界亟须解决的重要问题之一。

考虑到“唯增长论”的不足,同时为纠正单纯以经济增长速度为评定指标的偏向,中共中央组织部在 2013 年出台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由此学术界开始对地方政府考核目标转变展开丰富的研究。有学者认为官员考核指标转变会通过改变地方政府投资行为来影响经济增长与社会福利,^③ 部分学者分析了环保绩效考核如何影响地方政府环境治理行为,^④ 还有学

作者简介: 王文甫,西南财经大学财政税务学院教授;方也,西南财经大学财政税务学院博士研究生(成都 611130)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世界经济不确定性的测量、对中国金融风险效应及传导机制研究”(22AZD120)

- ① 刘瑞明、金田林《政绩考核、交流效应与经济发展——兼论地方政府行为短期化》,《当代经济科学》2015 年第 3 期。
- ② 魏婕等《财政偏向激励、地方政府行为和经济增长质量》,《经济科学》2016 年第 3 期。
- ③ 张军等《GDP 增速的结构性下调:官员考核机制的视角》,《经济研究》2020 年第 5 期。
- ④ 易承志、王艺璇《财政分权与官员晋升如何影响地方政府环境治理?——基于文献的分析》,《公共治理研究》2021 年第 5 期。

者研究发现中央绩效考核改革显著提升了地方官员对民生治理的关注。^① 更有学者在官员考核机制下，分析了地方政府行为影响经济发展质量的内在机制，认为“唯 GDP”的晋升激励机制不利于经济发展质量的提升。^② 由此可见，中央政绩考核指标如何设定会对地方政府行为产生直接影响，进而影响经济发展质量。已有研究多为实证研究，主要利用政绩考核发生转变的时间点做断点回归，^③ 分析考核目标转变的影响，缺乏理论层面上的讨论。另外关于经济发展质量的衡量相对较难，学术界暂无一个明确的定义及衡量标准，现有研究大多是通过构建指标体系来测度。^④ 魏婕等认为经济发展质量的衡量既包括投入产出效率也包括结构合理化等内容，^⑤ 方迎风、童光荣将经济发展质量的衡量标准简单化为效率与福利两个层面。^⑥ 鉴于此，本文在主流宏观理论框架下，从经济效率和经济福利两个维度衡量经济发展质量，考察地方政府考核目标转变的经济效率与福利效应。

目前已有研究运用 DSGE（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框架展开地方政府考核研究。梅冬洲等基于财政收入和支出指标，在模型设定中将地方政府的目标函数设定为追求政府支出规模的最大化。^⑦ 赵扶扬等在地方政府的目标函数中增加了其他地区产出水平，^⑧ 以此探讨地区竞争下地方政府行为与宏观经济波动之间的关系。王文甫等通过构建包含不同地方政府考核目标的 DSGE 模型比较了不同目标对地方债务和支出水平的影响。^⑨ 由此可见，在 DSGE 模型中主要通过调整地方政府所面临的目标函数来设定考核目标，这为本文的模型构建提供了参考。但现有 DSGE 文献仅关注静态地方政府考核目标的影响，暂未从考核目标转变视角出发研究地方政府考核。

政绩考核对经济发展质量主要存在地区竞争、市场分割、营商环境 3 条影响渠道。^⑩ 在政绩考核下，地方政府无形中形成了竞争压力，促使地理位置相近、行政级别类似的地方政府间展开关于基础设施、资本争夺和经济发展的竞争，^⑪ 这会对城市发展质量造成损害，不利于中国经济的长期可持续发展。同时政绩考核会造成落后地区为追赶发达地区而设立市场壁垒的现象，造成市场分割，阻碍地区间的经济合作。^⑫ 此外，在政绩考核下，理性的地方政府会具有明显的追求短期经济增长的偏好，地方政府会增加能带来更多产出水平上涨的硬公共品投入，忽视了营商环境等软公共品，长期来看不利于地区招商引资，必然对经济发展质量产生不良影响。^⑬

根据上述分析，本文认为当地方政府考核目标发生转变，在多元化考核指标下，地方政府会调整自身行为，对经济发展质量（经济效率及经济福利）产生一定影响。本文扩展了新开放宏观经济模型，通过构建一个包含地区竞争、市场分割和营商环境的 DSGE 模型来考察地方政府考核目标转变对经济发展质量的影响。

① 赵永辉、罗宇 《中央绩效考核与地方民生治理：迎风而动还是岿然不动》，《世界经济》2022 年第 10 期。

② 魏婕等 《财政偏向激励、地方政府行为和经济增长质量》，《经济科学》2016 年第 3 期。

③ 石凡、王克明 《地方政府官员环保考核压力与上市公司 ESG 表现》，《财经问题研究》2023 年第 6 期。

④ 钞小静、廉园梅 《劳动收入份额与中国经济增长质量》，《经济学动态》2019 年第 9 期。

⑤ 魏婕等 《财政偏向激励、地方政府行为和经济增长质量》，《经济科学》2016 年第 3 期。

⑥ 方迎风、童光荣 《经济增长质量的衡量标准：福利还是效率》，《宏观质量研究》2014 年第 3 期。

⑦ 梅冬洲等 《房价变动、土地财政与中国经济波动》，《经济研究》2018 年第 1 期。

⑧ 赵扶扬等 《竞争激励下的地方政府行为与宏观经济波动》，《世界经济文汇》2021 年第 5 期。

⑨ 王文甫、艾非 《投资冲动、债务扩张与地方政府激励目标》，《财贸研究》2021 年第 1 期。

⑩ 程中华、金伟 《财政分权影响中国经济绿色增长吗》，《财贸研究》2021 年第 3 期。

⑪ F. Pan, et al, "Developing by Borrowing? Inter-jurisdictional Competition, Land Finance and Local Debt Accumulation in China," *Urban Studies*, vol. 54, no. 4 (2017), pp. 897-916.

⑫ 刘斐然等 《区域经济差距、短期目标导向与市场分割》，《当代经济科学》2021 年第 4 期。

⑬ 后小仙等 《地方官员任期与营商环境优化》，《经济与管理评论》2020 年第 6 期。

二、特征事实与回归分析

(一) 特征事实

中国长期以来存在着以 GDP 为核心的政绩考核体系,为纠正“唯增长论”偏向,中央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办法改革、完善地方政府考核体系。中共中央组织部于 2006 年印发《体现科学发展观要求的地方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综合考核评价试行办法》,提出要改进和完善干部考核评价工作;于 2009 年 7 月 16 日印发《地方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综合考核评价办法(试行)》,明确提出要将“提高发展质量,转变发展方式”作为评价要点。2013 年,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要纠正当前单纯以经济增长速度作为评定政绩主要指标的偏好,同年中共中央组织部下发《关于改进地方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政绩考核工作的通知》,明确要求“不能仅仅把地区生产总值及增长率作为考核评价政绩的主要指标”,此时“唯增长论”得以缓解。2019 年 4 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党政领导干部考核工作条例》进一步提出考核政绩观中要“以造福人民为最大政绩”,增强人民获得感与幸福感。2020 年 10 月,中共中央组织部印发《关于改进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政绩考核的通知》,表明要“聚焦推动高质量发展优化政绩考核内容指标”。由此可见,在地方政府考核体系中,逐步弱化了以 GDP 增速等为代表的经济指标,越来越注重经济效率、民生福祉等指标。

(二) 地方政府考核目标转变对经济发展质量的回归分析

基于特征事实的分析可知,中国地方政府考核机制发生了转变,但其对经济发展质量的影响如何尚不清楚。基于此,本文通过实证对比地方政府考核机制调整前后是否能显著提升经济质量指标来进行评估。文章选取 2007—2017 年中国大陆除西藏外的 30 个省市自治区的省级面板数据作为研究对象,^① 采用以下回归模型来进行检验:

$$y_{it} = \alpha_0 + \gamma_1 D_{it} + \beta X_{it} + \lambda_t + \mu_i + \varepsilon_{it} \quad (1)$$

其中, y_{it} 为 i 地区第 t 年经济效率及福利指标的数值,本文以资本生产率-经济增长率 cp (国内生产总值/资本存量-经济增长率) 作为经济效率指标,^② 并以消费率 cr (居民消费/产出) 及居民福利 wel (人均可支配收入/人均产出) 作为经济福利指标。^③ D_{it} 为核心解释变量,用来反映地方政府考核机制的转变,考虑到考核指标在 2013 年之后才发生了根本性转变,^④ 所以在此处将 D_{it} 设定为哑变量,^⑤ 用“year”表示,2013 年以后为 1,2013 年及以前为 0。 X_{it} 为控制变量,包括经济发展程度 gdp (人均 GDP)、城镇化水平 $czhl$ (城镇人口占地区总人口的比重)、人口规模 $nmzrk$ (采用年末地区常住人口总规模)、财政分权程度 fd (各省预算内财政支出占中央预算内财政支出的比重) 及产业结构 $indstr$ (第二产业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 λ_t 和 μ_i 表示时间固定效应和个体固定效应。 ε_{it} 为扰动项,用于表示其余未捕捉到的因素对 y_{it} 的影响。同时为消除异方差和多重共线性干扰,此处对相关指标进行对数化处理。

表 1 第 (1) (2) 列反映了经济福利指标的回归结果,第 (3) 列反映了经济效率指标的回归结果。表 1 第 (1) (2) 列结果表明,在控制了省级及年份固定效应后,核心解释变量 D_{it} 中的福利指标 wel 、 cr 的系数均在 1% 的置信水平上显著为正,这初步反映了地方政府考核机制转变对经济发展质量

① 由于西藏自治区相关数据不完善,所以文章数据剔除了西藏自治区。由于 2007 年财政支出项目口径发生了变化,与往年数据不可比,所以文中采取数据从 2007 年开始,并且在数据库中居民消费水平、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等相关数据仅到 2017 年,所以我们文章数据范围也仅到 2017 年。数据来源为中国宏观经济数据库 EPS (<https://www.epsnet.com.cn/>)。

② 沈坤荣、傅元海《外资技术转移与内资经济增长质量——基于中国区域面板数据的检验》,《中国工业经济》2010 年第 11 期。资本存量采用永续盘算法进行测算。

③ 方迎风、童光荣《经济增长质量的衡量标准:福利还是效率》,《宏观质量研究》2014 年第 3 期。

④ 张军等《GDP 增速的结构性下调:官员考核机制的视角》,《经济研究》2020 年第 5 期。

⑤ 方迎风、童光荣《经济增长质量的衡量标准:福利还是效率》,《宏观质量研究》2014 年第 3 期。

中的居民福利指标存在显著促进作用。第（3）列结果表明，核心解释变量 D_{it} 中经济效率指标 cp 的系数在5%的置信区间上显著为正，这也反映了地方政府考核机制转变对经济发展质量中的经济效率指标存在显著激励作用。实证分析表明，中国地方政府考核机制的转变对经济发展质量产生了显著正向作用。

表 1 回归结果

	(1) wel	(2) cr	(3) cp
year	0.640*** (5.37)	0.726*** (3.78)	0.425** (2.48)
lngdp	-0.680*** (-5.60)	-0.819*** (-3.77)	-0.355** (-2.73)
czhl	-0.001 (-0.44)	0.018 (1.68)	-0.001 (-0.13)
indstr	-0.006 (-0.03)	-0.820 (-0.94)	0.763** (2.52)
fd	0.034 (0.21)	-0.517 (-0.93)	-0.002 (-0.01)
lnnmzrk	0.709*** (3.16)	-0.516 (-1.36)	0.229 (0.65)
Constant	0.990 (0.88)	12.982*** (3.44)	1.340 (0.43)
观测数	300	300	300
R ²	0.833	0.450	0.266
省份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年份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注：*、**、*** 分别表示在 10%、5% 和 1% 的水平上显著；本文所使用的数据来自中国宏观经济数据库 EPS (<https://www.epsnet.com.cn/>)。

三、DSGE 模型构建

为进一步研究地方政府考核目标转变对经济发展质量的影响，本文以新开放宏观经济模型为基础构建了一个覆盖两地区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以探讨地方政府考核目标转变对经济发展质量的影响及传导机制。与以往模型的不同之处主要在于：第一，将多元化地方政府考核目标纳入一般均衡模型中，这对完善中国化多级政府模型的构建是一个有利的尝试。第二，模型采用拉姆齐算法，得出地方政府纳什均衡下的结果，更贴合实际。第三，同时将地区竞争、市场分割及营商环境纳入理论模型，这为讨论地方政府考核目标转变对经济发展质量的中间作用机制提供了一个框架。

在该模型中，设定两个地区的经济主体面对同一个中央政府及中央银行，每个地区的经济主体均包括家庭、厂商及地方政府。同时假定两地区间的劳动不能自由流动，两地区生产的最终产品可在全国完全竞争的市场上进行交易。

在该模型中，两地区经济通过以下 4 条渠道连接：（1）中央政府从两地区家庭部门获得一次性税收；（2）中央银行通过利率规则影响债券的利率、通胀及产出水平，进而对两地区经济发展产生影响；（3）地方政府间存在关于市场分割的策略互动，两地区间商品、资本市场处于不完全分割状态；（4）在财政分权的影响下，地方政府间存在地区竞争，一个地区产出水平的变化会直接影响另一个地区地方政府的决策。

特别说明，由于模型涉及两地区（本地区与外地），出现的变量及方程比较多，本文在不影响理解的前提下仅展示了本地区及中央政府的方程设定，文中本地区的变量为正常表示，外地的变量均带有*（如， y_t 表示本地区的产出水平， y_t^* 表示外地的产出水平）。

（一）家庭部门

假设经济体中存在一系列连续的代表性家庭，通过选择消费 c_t 并提供劳动 n_t 来最大化其终身效

用, 其目标函数为:

$$E_t \left\{ \sum_{t=0}^{\infty} \beta^t \left[\frac{(c_t - h_t)^{1-\sigma_c}}{1-\sigma_c} - \varepsilon_n \frac{n_t^{1+\psi}}{1+\psi} \right] \right\} \quad (2)$$

其中, $0 < \beta < 1$ 为居民的主观贴现因子, $h_t = h_c c_{t-1}$ 为居民的消费习惯存量。 ε_n 为闲暇时间相对于消费时间的权重。 σ_c 为家庭的风险厌恶系数, ψ 为家庭劳动供给弹性的倒数。

家庭面临的预算约束为:

$$c_t + i_t + b_{g,t} = b_{g,t-1} r_{t-1} + w_t n_t + (r_t^k z_t - p_t a c_t^z) k_{t-1} + \varphi_t - tax_t - T_{cen,t} \quad (3)$$

预算约束式等号的左边为家庭支出, 包括了消费 c_t 、物质资本的投资 i_t 以及对当地政府债券的投资 $b_{g,t}$ 。等号的右边表示剔除了交付给地方政府及中央政府的一次性税收 tax_t 、 $T_{cen,t}$ 后的家庭可支配收入, 包括上期所持有的债券利息收入 $b_{g,t-1} r_{t-1}$ 、劳动的工资收入 $w_t n_t$ 、资本收益 $(r_t^k z_t - p_t a c_t^z) k_{t-1}$ 以及垄断企业的利润 φ_t , z_t 是资本利用率, $a c_t^z = (\varphi_z / 2) (z_t - 1)^2$ 是资本利用调整成本, φ_z 为资本使用率成本参数。

家庭面临的另一个约束为资本的积累方程:

$$k_t = (1 - \delta) k_{t-1} + \left(1 - \frac{\varphi_i}{2} \left(\frac{i_t}{i_{t-1}} - 1 \right)^2 \right) i_t \quad (4)$$

其中, δ 为资本折旧率, $\frac{\varphi_i}{2} \left(\frac{i_t}{i_{t-1}} - 1 \right)^2$ 表示资本调整成本。

由于网购、金融市场的完善, 居民的消费与投资并不仅仅局限于所在地, 这体现了商品及资本市场的不完全分割。本文假定居民对消费品和投资品的复合如下 CES 形式:

$$x_t = \left((1 - \alpha)^{\frac{1}{\mu}} (x_{h,t})^{\frac{\mu-1}{\mu}} + \alpha^{\frac{1}{\mu}} (x_{f,t})^{\frac{\mu-1}{\mu}} \right)^{\frac{\mu}{\mu-1}} \quad (5)$$

其中 $x = \{c, i\}$, $x_{h,t}$ 为本地居民对本地产品的消耗, $x_{f,t}$ 为本地居民对外地产品的消耗, α 表示居民对于本地产品的偏好, μ 表示两地产品之间的替代弹性。

家庭在预算约束及资本积累方程的约束下, 求解效用的最大化, 得到关于资本存量、投资和利用率的一阶条件:

$$E_t \left(\frac{u_{c,t+1}}{u_{c,t}} \left(q_{t+1} (1 - \delta) + \frac{r_{t+1}^k}{p_{t+1}} z_{t+1} - \frac{\varphi_z}{2} (z_{t+1} - 1)^2 \right) \right) = q_t / \beta \quad (6)$$

$$q_t \left(1 - \frac{\varphi_i}{2} \left(\frac{i_t}{i_{t-1}} - 1 \right)^2 \right) - \varphi_i \left(\frac{i_t}{i_{t-1}} - 1 \right) \frac{i_t}{i_{t-1}} + \beta E_t \left(\frac{u_{c,t+1}}{u_{c,t}} q_{t+1} \varphi_i \left(\frac{i_t}{i_{t-1}} - 1 \right) \left(\frac{i_t}{i_{t-1}} \right)^2 \right) = 1 \quad (7)$$

$$\frac{r_t^k}{p_t} - \varphi_z (z_t - 1) = 0 \quad (8)$$

(二) 厂商部门^①

1. 中间品厂商的优化行为

假设中间品厂商生产函数如下:

$$y_t(\omega) = A_t (k_t^s(\omega))^{\iota} (l_t(\omega))^{1-\iota} \quad (9)$$

其中, $k_t^s(\omega)$ 是生产中使用的有效资本, 定义为 $k_t^s(\omega) = z_t k_t(\omega)$ 。 $l_t(\omega)$ 表示劳动投入, ι 表示资本的收入比重, A_t 表示当地的全要素生产率, 有:

$$A_t = \varepsilon_{a,t} \left(\frac{k_{g,t}}{\bar{k}_g} \right)^{\iota_g} \quad (10)$$

这表明地方政府的公共资本 $k_{g,t}$ 会影响到当地的生产水平。其中, ι_g 表示公共资本波动对生产率

^① 为节省篇幅, 此处将最终品厂商相关设定省略。

影响的弹性系数, $\varepsilon_{a,t}$ 服从 AR (1) 过程: $\ln \varepsilon_{a,t} = \rho_{a,t} \ln(\varepsilon_{a,t-1}) + \sigma_{a,t}$ 的生产率冲击。公共资本存量的积累过程为 $k_{g,t} = (1 - \delta_g) k_{g,t-1} + \left(1 - \frac{\varphi_{g,k}}{2} \left(\frac{g_{k,t}}{g_{k,t-1}} - 1\right)^2\right) g_{k,t}$, 其中 $\frac{\varphi_{g,k}}{2} \left(\frac{g_{k,t}}{g_{k,t-1}} - 1\right)^2$ 表示公共资本调整成本, $\varphi_{g,k}$ 为公共资本调整成本系数, δ_g 为公共资本折旧率。厂商追求成本最小化, 上述方程对有效劳动 $l_t(\omega)$ 和有效资本 $k_t^s(\omega)$ 求导并化简可得中间品厂商的优化方程:

$$k_t^s(\omega) = \frac{\iota}{1 - \iota} \frac{w_t}{r_t^k} l_t(\omega) \quad (11)$$

名义边际成本可表示为:

$$mc_t(\omega) = mc_t = (A_t)^{-1} (r_t^k)^{\iota} (w_t)^{1-\iota} \iota^{-1} (1 - \iota)^{-(1-\iota)} \quad (12)$$

2. 中间品厂商定价

根据 Calvo (卡尔沃) 定价的设定, 本文假设每期有 $1 - \eta^p$ 比例的厂商调整其价格, 其余 η^p 比例的厂商无法对其产品价格进行调整, 只能根据滞后的 CPI 通胀指数对其上期价格进行指数化更新。厂商通过选择生产价格 $p_{h,t}$ 来最大化其跨期的生产利润, 该最优价格选择问题可表述为:

$$\begin{aligned} \max_{p_{h,t}(\omega)} \sum_{i=0}^{\infty} (\beta \eta^p)^i E_t \left(\frac{u_{n,t+i}}{u_{c,t}} \frac{p_t}{p_{t+i}} \left(p_{h,t}(\omega) \left(\frac{p_{h,t+i-1}}{p_{h,t-1}} \right)^{\gamma^p} y_{t+i}(\omega) - mc_{t+i} y_{t+i}(\omega) \right) \right) \\ s. t. y_t(\omega) = \left(\frac{p_{h,t}(\omega)}{p_{h,t}} \right)^{-\theta^p} y_t \end{aligned} \quad (13)$$

(三) 地方政府部门

中央银行通过货币规则对经济进行调节, 假设其遵循以下规则:

$$\frac{r_t}{r} = \left(\frac{r_{t-1}}{r} \right)^{dr} \left((\pi_t \pi_t^*)^{0.5} \frac{y_t + y_t^*}{\bar{y} + \bar{y}^*} \right)^{dy} \quad (14)$$

其中, dr 、 $d\pi$ 和 dy 分别为对利率、通胀水平及产出的反应参数。

地方政府的收入主要来源于税收及发行的债券, 并满足如下预算约束:

$$tax_t + b_{g,t} - \frac{b_{g,t-1} r_{t-1}}{\pi_t} = g_t \quad (15)$$

其中 g_t 为本地政府支出, $\bar{b}_g$ 为本地政府债券稳态水平, r_{t-1} 表示地方政府债券利率。

地方政府主要进行消费性支出 $g_{c,t}$ 以及投资性支出 $g_{k,t}$ 。地方政府分别将这两类支出作为政策函数, 在追求自身效用最大化的前提下做出决策。

地方政府追求自身效用最大化, 根据相关研究设定地方政府关注产出目标函数,^① 即:

$$\max E_t \left(\sum_{i=0}^{\infty} \beta^i \varepsilon_{gz,t} \left(\ln \frac{y_t}{\bar{y}} - \varphi_y^* \ln \frac{y_t^*}{\bar{y}^*} \right) \right) \quad (16)$$

其中 $\varepsilon_{gz,t}$ 的表示地方政府短期内对于经济增长目标偏好的上涨, 服从 $\ln \varepsilon_{gz,t} = \rho_{gz} \ln \varepsilon_{gz,t-1} + e_{gz}$ 的 AR (1) 过程。 φ_y^* 表示地方政府目标是否包含和其他地区对比的成分。这里将地方政府效用表示为其产出相对于稳态产出偏离的百分比的形式, 以防止数值差异对边际效应的影响。

在模型的实际处理过程中, 所有其他方程都会成为两个地方政府的约束方程。两个地区的地方政府在整个经济运行的基础上进行博弈并产生纳什均衡。

(四) 中央政府部门

本文主要考察地方政府考核目标转变对经济发展质量的影响, 故而简化对中央政府的设定。中央

① 朱军、许志伟 《财政分权、地区间竞争与中国经济波动》, 《经济研究》2018 年第 1 期; 王文甫等 《财政分权与经济结构失衡》, 《经济研究》2020 年第 5 期; 艾非、王文甫 《分税制、地区竞争与地方政府债务扩张》, 《当代经济科学》2021 年第 6 期。

政府主要面临如下预算约束：

$$T_{cen,t} + T_{cen,t}^* = g_{cen,t} \quad (17)$$

其中 $T_{cen,t}$ 和 $T_{cen,t}^*$ 表示中央政府从两个地区获得的一次性税收， $g_{cen,t}$ 表示中央政府的支出（本文将其简化为在两个地区平均分配）。

（五）市场出清

商品市场的均衡满足：

$$y_t = (1 - \alpha) \left(\frac{p_{h,t}}{p_t} \right)^{-\mu} \left(c_t + i_t + \frac{\varphi_i}{2} \left(\frac{i_t}{i_{t-1}} - 1 \right)^2 k_{t-1} + g_t \right) + \alpha \left(\frac{p_{h,t}}{p_t^*} \right)^{-\mu} \left(c_t^* + i_t^* + \frac{\varphi_i^*}{2} \left(\frac{i_t^*}{i_{t-1}^*} - 1 \right)^2 k_{t-1}^* + g_t^* \right) + \frac{1}{2} g_{cen,t} \quad (18)$$

（六）经济发展质量指标设定

根据特征事实本文将经济发展质量的内涵从效率维度拓展到福利维度，^① 经济发展质量指标的设定也就包含了经济效率和经济福利两部分。

从经济效率角度来看，效率关注的是经济增长本身，Feldstein（费尔德斯坦）和 Summers（萨摩斯）利用美国资本边际产出率远高于经济增长率来说明美国经济是动态有效率的。^② 王晓芳和施少华根据资本边际产出与实际经济增长率的比较，认为我国经济在 20 世纪 90 年代之前有效率，90 年代后是无效率的。^③ 所以此处，本文用资本生产率与经济增长率的比较来反映经济效率。从经济福利角度来看，福利考虑的是经济增长给居民带来的福利，即经济增长的惠民性。如果一个国家经济快速增长，但居民却享受不到经济增长带来的好处，收入差距不断放大，那这样的经济增长绝对称不上是好的经济发展质量。因此本文采用经济增长率及资本生产率-经济增长率作为经济效率指标来代表效率维度，用消费率（居民消费/产出）及经济增长居民福利（人均可支配收入/人均产出）作为经济福利指标来代表福利维度。^④

四、数值模拟

（一）参数校准

参考 DSGE 模型求解的一般步骤，这里需要对数值模拟中相应的参数进行赋值和估计。

家庭部门的主要参数包括 $\{\beta, \psi, \sigma_c, \mu, \varphi_z\}$ 。将居民效用贴现参数 β 设定为 0.99，^⑤ 且由于劳动力供给弹性的倒数 ψ 一般在 1 到 2 之间，此处取 1.3。居民消费跨期替代弹性的倒数 σ_c 取值为 1.1。资本使用率成本参数 φ_z 设定为 0.175，不同地区之间商品的替代弹性 μ 为 1.5。^⑥

① 牛欢、严成樑 《环境税收、资源配置与经济高质量发展》，《世界经济》2021 年第 9 期。

② M. Feldstein and L. Summers, "Is the Rate of Profit Falling?," *Brookings Papers on Economic Activity* *Brookings Papers on Economic Activity*, vol. 8, no. 1 (1977), pp. 211-228.

③ 王晓芳、王维华 《我国经济运行的“动态效率”——基于居民储蓄-消费决策机制的实证判断》，《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07 年第 8 期。

④ 方迎风、童光荣 《经济增长质量的衡量标准：福利还是效率》，《宏观质量研究》2014 年第 3 期。资本生产率用 GDP/资本存量表示。

⑤ 梅冬州等 《房价变动、土地财政与中国经济波动》，《经济研究》2018 年第 1 期。

⑥ S. Auray and A. Eyquem, "Welfare Reversals in a Monetary Union," *American Economic Journal: Macroeconomics*, vol. 6, no. 4 (2014), pp. 246-290.

厂商部门的主要参数包括 $\{\iota, \iota_g, \delta, \delta_g, \eta^p, (\theta^p-1)^{-1}, \gamma^p\}$ 。^① 参照全冰的做法,^② ι 对应了稳态资本收入份额, 基于历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各地区国内生产总值结构”项目计算得到 1999—2017 年劳动者报酬收入比例均值为 54.8%, 设定 ι 为 0.43, 这一数值也与许志伟等的估计结果 0.4478 接近。^③ 对于政府公共资本的产出弹性 ι_g , 参照刘凯的做法,^④ 将其设定为 0.2。将私人资本折旧率 δ 与公共资本折旧率 δ_g 均校准为 0.025,^⑤ 此处假定这两种资本的使用年限为 10 年。关于价格粘性部分参数的设定, 将厂商不能调整价格的概率 η^p 设为 0.75。^⑥ 价格指数化程度 γ^p 取 0, 稳态价格溢价 $(\theta^p-1)^{-1}$ 设定为 0.5。

政府部门的主要参数包括 $\{\beta_g, \alpha_g, \alpha_{gk}, dr, d\pi, dy, \varphi_y^*\}$ 。地方政府主观贴现率 β_g 取 0.9。关于政府支出部分参数的设定如下。根据中国统计年鉴 2008—2019 年数据, 中央与地方政府总支出占 GDP 比重的均值约为 23%, 而地方与中央政府支出的占比分别为 83% 和 17%, 故本文将 α_g 设定为 0.19, 即地方政府支出占该地产出的 19%; 参照金戈的设定,^⑦ 中国基础设施建设支出占 GDP 的比重为 9%, 通过计算得到 α_{gk} 为 0.39。^⑧ 货币政策的参数部分, 本文假定通过调节短期利率来应对经济的变动, 并且货币规则满足 Taylor 规则, 借鉴已有文献, 相关参数校准结果为 0.95、1.35、0.30。 φ_y^* 取 0 或 1, 取 1 表示不同地区间存在标尺竞争, 取 0 即表示不存在此种竞争。

接下来对模型中部分稳态值进行校准, 对于结构性的参数 $\{\varepsilon_n, tax, tax^*, T_{cen}, T_{cen}^*\}$, 结合理论模型得到的最优性条件, 求出模型的稳态值, 并将稳态点的变量用外生参数表示, 再反推出相应的参数取值。 ε_n 是劳动的负效用权重, 基于家庭部门的一阶条件, 调整 ε_n 使得劳动供给的稳态值为 1, 通过计算可得 ε_n 为 0.567。根据政府部门参数的设定, 调整 T_{cen} 和 T_{cen}^* 以使得中央政府支出占总产出的 17%, 即 $T_{cen}/2y=0.02$ 和 $T_{cen}^*/2y=0.02$; 对于政府目标债务的设定, 现有研究认为大多地方政府债务存在最优规模,^⑨ 且若以平均偿债期限为 10 年来计算, 大多数研究认为政府的最优债务总额约为 GDP 的 50% 到 90% 不等,^⑩ 本文取中间值, 通过调整参数 tax 使得地方政府债务规模为 GDP 的 70%。

(二) 数值模拟

1. 基准模型脉冲响应分析

在财政分权下, 地方政府面临上级对其地区经济绩效的定量考核, 晋升压力导致地方政府徘徊于短期经济增长与提升居民生活质量的权衡中, 继而影响到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进程。如图 1 所示, 在传统地方政府考核机制下, 本地政府短期偏好上涨冲击对本地区经济增长、经济效率及经济福利指标

① 此处 $(\theta^p-1)^{-1}$ 主要出现在模型中中间品厂商定价处“价格演变过程”方程中, 但出于篇幅考虑文章将之删除, 如果有读者对此感兴趣, 可向作者索取。

② 全冰 《混频数据、投资冲击与中国宏观经济波动》, 《经济研究》2017 年第 6 期。

③ 许志伟、林仁文 《我国总量生产函数的贝叶斯估计——基于动态随机一般均衡的视角》, 《世界经济文汇》2011 年第 2 期。

④ 刘凯 《中国特色的土地制度如何影响中国经济增长——基于多部门动态一般均衡框架的分析》, 《中国工业经济》2018 年第 10 期。

⑤ 王国静、田国强 《政府支出乘数》, 《经济研究》2014 年第 9 期。

⑥ 梅冬州、温兴春 《外部冲击、土地财政与宏观政策困境》, 《经济研究》2020 年第 5 期。

⑦ 金戈 《中国基础设施资本存量估算》, 《经济研究》2012 年第 4 期。

⑧ 此处 α_g 由 $0.23 \times 0.83 \approx 0.19$ 得到。本文地方政府给予居民的民生补贴性支出的数据主要是指社会保障和就业项的支出。本文假设在基础设施投资中中央与地方的占比相同, 此时地方政府投资性支出占地方政府支出的比重

α_{gk} 由 $\frac{g_k}{g} = \frac{g_k}{y} / \frac{g}{y} = 0.09/0.23 = 0.39$ 计算得到。

⑨ 缪小林、赵一心 《地方债对地区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影响——基于不同财政独立性的分组考察》, 《财贸经济》2019 年第 12 期; 范剑勇、莫家伟 《地方债务、土地市场与地区工业增长》, 《经济研究》2014 年第 1 期。

⑩ C. Checherita-Westphal and P. Rother, “The Impact of High Government Debt on Economic Growth and Its Channels: An Empirical Investigation for the Euro Area,” *European Economic Review*, vol. 56, no. 7 (2012), pp. 1392–1405.

产生了显著的动态影响。图中第 1 行第 2 列反映了表征经济效率指标(资本生产率-经济增长率)的脉冲响应图,而第 2 行反映了表征经济福利指标(消费率、居民福利)的脉冲响应图。

图 1 第 1 行显示,当本地区的地方政府短期偏好受到一个标准差的正向冲击时,经济增长率在冲击发生的当期便上涨到最大值,随后在前 4 期出现较为陡峭的下降,再较为平缓的回归稳态;而资本生产率-经济增长率恰恰相反,在冲击来临初期下降至最低点,随后慢慢回升至稳态。图 1 第 2 行显示,消费率、居民福利面对地方政府短期偏好上涨冲击时的动态响应与资本生产率-经济增长率情形大致相似,均是在冲击来临当期就下降至最低点,随后开始较为迅速的上涨,由负转正,再逐渐回落至稳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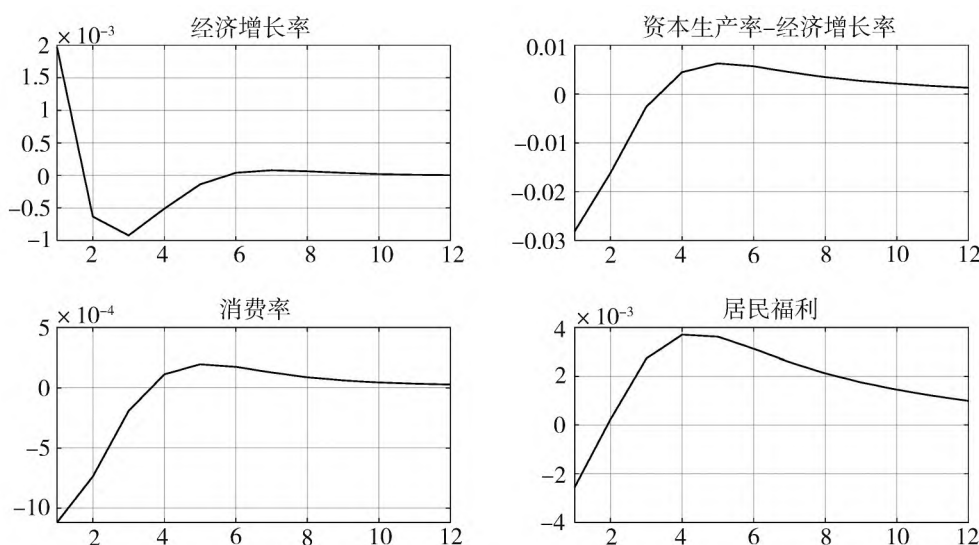


图 1 传统考核机制下地方政府短视冲击的脉冲响应结果

总的来说,在传统地方政府考核机制下,地方政府短期偏好上涨冲击对经济福利指标(消费率、居民福利)的作用方向呈现下降趋势,经济增长率呈现上涨趋势,但经济效率指标却相反。这说明传统地方政府考核机制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某地区短期内的经济增长,但并不利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那么这一影响的具体传导机制是怎样的呢?接下来本文将通过反事实模拟来进行中间传导机制的渠道分析。

(1) 地区竞争的影响

我国的财政分权体制显著推动了地方政府间的竞争,^①激发了地方官员发展经济的热情,对经济发展质量产生影响。前文分析可知,在传统地方政府考核机制下,地方政府的经济增长目标导向会进一步促使其在进行当地经济决策时考虑到外地经济发展情况。所以,在本文模型中,主要将这种竞争设定为式(16)的形式,即当存在地区竞争时,地方政府的效用函数中会包含其他地区产出的相对水平变化,这就加深了两个地区间的联系。^②图 2 表明在有无地区竞争情形下,地方政府短期偏好上涨冲击对资本生产率-经济增长率、消费率、居民福利这些指标的作用方向均为负,对经济增长率的作用方向为正,并且当存在地区竞争(case1)时,无论是正方向还是负方向,在地方政府短期偏好上涨冲击来临初期对经济发展质量指标的作用程度均更大。可见,地区竞争的存在不利于经济高质量发展,地区竞争会激励地方政府更偏向于短期经济增长效应而忽视长期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 & 居民生活质量的提升。^③

① D. van der Kamp, P. Lorentzen, and D. Mattingly, "Racing to the Bottom or to the Top? Decentralization, Revenue Pressures, and Governance Reform in China," *World Development*, vol. 95 (2017), pp. 164-176.

② 朱军、许志伟 《财政分权、地区间竞争与中国经济波动》,《经济研究》2018 年第 1 期。

③ 储德银、费冒盛 《地方政府竞争、支出行为调整与经济高质量发展》,《江南大学学报》2021 年第 5 期。

那么，为什么会出现“地区竞争的存在对资本生产率-经济增长率、消费率和居民福利的作用方向为负”呢？本文将从以下 3 个方面加以解释。

一是资本生产率-经济增长率的反馈机制。第一，观察图 2 第 1 行可知，经济增长率的增长幅度最大为 0.2%，而资本生产率-经济增长率的下降幅度最大接近 3%，由此本文认为在资本生产率-经济增长率指标中占主导地位的是资本生产率的变化。第二，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间存在信息不对称现象，这就导致中央政府只能采取一些便于统计的显性指标（如经济增长水平）对地方政府进行考核，地方政府就会忽视自身经济情况而盲目追赶经济增长，陷入投资过剩的困境，损害了资本的生产效率。第三，政府财政支出的来源大部分是税收，那么公共投资增加必然会损害家庭的收入水平，这就对居民的消费和投资产生挤出效应。另外，由于政府公共投资具有外部性，^① 即公共资本可以提升资本的边际生产效率，换言之就是资本回报率会随之上涨，此时家庭就会增加投资而挤出私人消费。根据边际递减原理，随着投资的增加其投资生产率必定会在某一临界点开始下降，并且下降幅度要远远大于经济增长率的幅度，这反映到图 1 中就是第 1 行第 1 列的资本生产率-经济增长率下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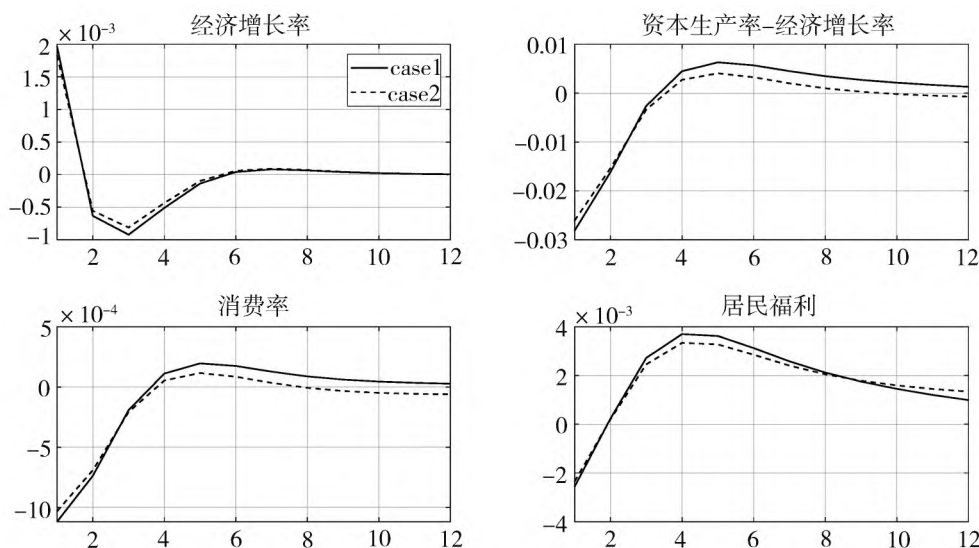


图 2 有无地区竞争情形下的脉冲响应结果对比图

二是消费率的反馈机制。一方面，由于资本回报率增加，资本会对居民消费产生替代效应，挤出部分消费。另一方面，资本回报率上涨还会反映到家庭收入上，继而产生了收入效应，导致居民消费增加。由此可见，此时替代效应的作用要大于收入效应，反映到图 1 中即为第 2 行第 1 列的消费率下降。

三是居民福利的反馈机制。一方面，根据上述机制的作用，地方政府会忽视自身经济情况而盲目追赶经济增长，陷入投资过剩的困境，那么公共投资增加必然会损害家庭的收入水平，而本文中居民福利指标用人均可支配收入/人均产出反映，那么反映到居民福利指标上，就呈现负面效应。另一方面，地方政府在地区竞争的作用下，忽视了对居民生活质量的提升，原本可用于提升居民福利的财政资源被挤出，用于可带来短期经济绩效的公共资本投入，这就进一步损害了居民福利。

(2) 市场分割的影响

很多学者都认为地方政府政绩考核会加剧市场分割现象，^② 这必然会对经济发展质量产生影响。^③ 所以在本文的模型设定中，将家庭对两地商品及资本的选择方式设定为式 (5) 的形式，

① 郭长林等 《财政政策扩张、偿债方式与居民消费》，《管理世界》2013 年第 2 期。

② 刘斐然等 《区域经济差距、短期目标导向与市场分割》，《当代经济科学》2021 年第 4 期。

③ 杨继东、罗路宝 《产业政策、地区竞争与资源空间配置扭曲》，《中国工业经济》2018 年第 12 期。

α 表示家庭对本地商品及资本的偏好程度，当 $\alpha=0.5$ 时表明家庭对本地和外地的偏好程度相同，也就是市场是完全不分割的；当 $\alpha=0$ 时表明家庭完全不会购买外地产品，也就意味着市场是完全分割的；当 $0<\alpha<1$ （且 $\alpha\neq 0.5$ ）时表明市场是不完全分割的。在图 3 中，展示了在 $\alpha=0$ （case1）和 $\alpha=0.5$ （case2）情形下，地方政府短期偏好上涨冲击对经济发展质量指标的动态影响，这可以从侧面反映市场分割在其中起到的作用。图 3 的模型模拟结果显示在市场完全不分割及市场完全分割下，政府短期偏好冲击对经济效率指标和经济福利指标的作用方向一致，均是在冲击来临初期下降到最低点，随后逐步上升，最终回归稳态；当市场完全分割（case1）时，在地方政府短期偏好上涨冲击来临初期对经济发展质量指标的作用程度均要更大。由此说明，市场分割显著抑制了经济效率及经济福利的提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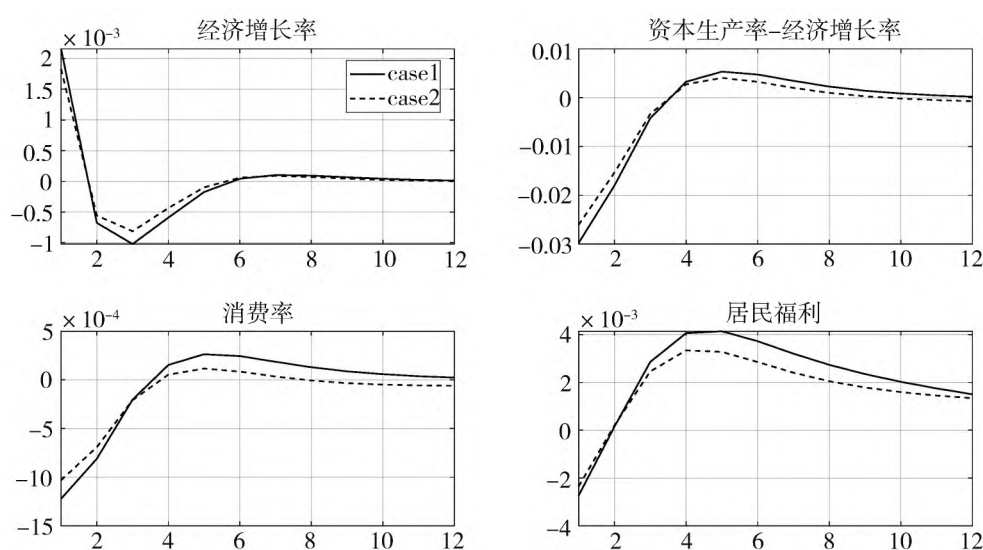


图 3 有无市场分割情形下的脉冲响应结果对比图

本文认为可从以下两方面解释为何“市场分割不利于经济发展质量”。第一，市场分割相当于市场碎片化，这就直接影响了规模经济，阻碍了商品及资本在市场上的自由流通，不利于资源配置效率的提升，对资本生产率及劳动生产率产生负向效应。资源配置效率优化受到限制后，必然会影响到经济增长，居民收入也会减少，消费率及居民福利也会随之下降。第二，根据前文可知公共资本具有一定的外部性，由于市场分割造成了地区间投资的障碍，那么公共资本外部性的作用发挥就会受到限制，降低了不同地区间类似企业开展技术创新的竞争，^① 给技术进步带来消极影响，进而抑制了经济效率及经济福利的提升。

（3）营商环境的影响

在传统地方政府考核机制下，地方政府存在明显的短期经济增长偏好，这会造成地方片面追求经济增速的粗放型发展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忽视营商环境的优化、挤占营商环境优化的投入。虽然短期内经济快速增长，但营商环境必然会对长期经济增长及稳定性带来影响。^② 结合托宾 Q 理论，优化营商环境即降低微观主体投资调整成本，从而使托宾 Q 效应增强，理论上有利于经济效率的提升。结合理论模型中式（4）中投资调整成本的设定，可知随着营商环境优化，投资调整成本参数 φ_i 会变小。图 4 展示了在 $\varphi_i=0.1$ （case1）和 $\varphi_i=10$ （case2）情形下，地方政府短期偏好上涨冲击对经济发展质量指标的动态影响，这可以从侧面反映不同营商环境在其中起到的作用。图 4 的模型模拟结果显示在两种营商环境下，政府短期偏好冲击对经济效率指标和经济福利指标的作用方向一致，均呈现为鞍形，在冲击来临初期下降到最低点，随后逐步上升达到最高点，然

① 卞元超等 《市场分割与经济高质量发展：基于绿色增长的视角》，《环境经济研究》2019 年第 4 期。

② 后小仙等 《地方官员任期与营商环境优化》，《经济与管理评论》2020 年第 6 期。

后逐渐下降，最终回归稳态；但营商环境越差（case2），在地方政府短期偏好上涨冲击来临初期对经济发展质量指标的作用程度均要越大。由此说明，地方政府忽视了对营商环境的优化确实会抑制经济效率及经济福利的提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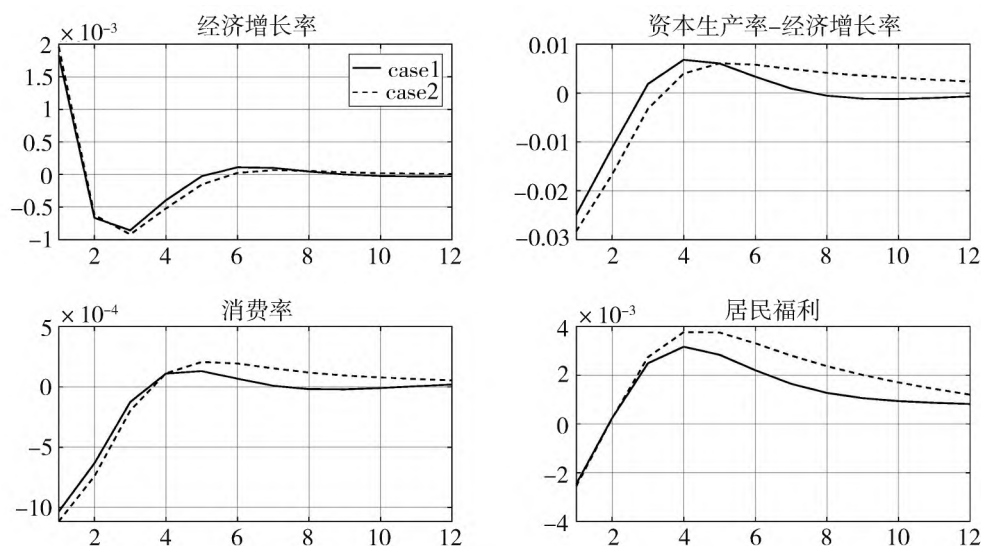


图 4 不同营商环境下的脉冲响应结果对比图

2. 多元化考核指标模型的脉冲响应分析

在分析了传统地方政府考核指标对经济发展质量影响的传导机制后，本文接下来考虑在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背景下，多元化地方政府考核指标是否有利于经济发展质量的提升？地区竞争、市场分割及营商环境又在其中起到了怎样的作用？

（1）多元化地方政府考核指标设定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强调“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在传统考核指标下，存在重复建设、低效率等一系列消极的影响，^①这恰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要求相违背。2019 年 4 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党政领导干部考核工作条例》提出考核政绩观中要“以造福人民为最大政绩”，增强人民获得感与幸福感。2020 年 10 月，中共中央组织部颁布《关于改进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政绩考核的通知》，将高质量发展综合绩效评价作为官员政绩考核的重要组成部分，提出“切实转变发展方式，推动质量变革、效率变革”，“把为民造福作为最重要的政绩”。基于上述文件，遵循少而精、客观等原则，本文构建了多元化地方政府考核指标，实证检验地方政府考核指标多元化是否有利于经济发展质量的提升。

借鉴国内外相关指标体系的设计，^②本文构建了由经济结构调整、产出效率提升、经济成果惠民 3 个部分组成的多元化地方政府考核指标，如表 1 所示。这些考核指标的设定符合大多学者提出的论断：当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时，需在保证适度经济增长的同时注重提高支出效率，改善经济结构，优化资源配置，特别要强调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是高质量发展的出发点、落脚点和根本标志。^③

① 刘江会、王功宇《地方政府财政竞争对财政支出效率的影响——来自长三角地级市城市群的证据》，《财政研究》2017 年第 8 期。

② 马茹等《中国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及测度研究》，《中国软科学》2019 年第 7 期；逢锦聚等《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笔谈》，《经济学动态》2019 年第 7 期；魏敏、李书昊《新时代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的测度研究》，《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18 年第 11 期；高培勇等《高质量发展背景下的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一个逻辑框架》，《经济研究》2019 年第 4 期。

③ 逢锦聚等《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笔谈》，《经济学动态》2019 年第 7 期。

表 2 中央对地方政府考核的多元化指标

指标类型	指标含义	对应指标
经济结构调整	规范政府行为，从政府主导转向市场主导	政府支出比重
	扩大内需，释放巨大的内需潜力	居民消费产出比重
产出效率提升	充分利用要素资源，提升要素的投入产出效率，提高生产要素的经济效益	资本生产率
		劳动生产率
经济成果惠民	保障居民美好生活	居民消费产出比重

经济结构调整。它是由当前国际经济发展情况决定的，是国内经济形势的客观需要，新时代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要求加速经济结构优化调整。^① 首先，让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从政府主导转向市场主导，构建公共服务型政府。^② 优化资源配置，激发国内各类市场主体活力，促进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避免政府在经济高质量发展中的过多干预，具体以政府行为规范指标（政府支出比重）来揭示。^③ 其次，扩大内需是中国在新发展阶段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随着当前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变，居民拥有消费升级的强烈需求，如果居民消费能力得以提升，那么就能推动释放巨大的内需潜力，有助于将我国经济由“投资型驱动”转向“消费型驱动”。此处具体以居民消费产出比重来表示居民内需拉动经济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供给侧改革的成效和对居民消费的贡献。^④

产出效率提升。之前中国经济增长主要依赖于大规模的物质资本和劳动力投入，仅仅关注由要素积累带来的经济数量增长，而忽视了要素之间的合理配置，导致要素产出效率低下，大量要素得不到充分利用。^⑤ 随着中国发展进入城市化和经济结构服务化阶段，原先依赖的“粗放型”增长方式难以继，迫切要求提质增效，提升要素投入产出效率，提高经济发展质量水平。主要生产要素是资本与劳动，因此本文以资本生产率（GDP/全社会资产投资额）与劳动生产率（GDP/全部从业人员数量）来反映经济发展质量。^⑥

经济成果惠民。高质量发展是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发展。美好生活需要有足够的个人可支配收入来满足其消费及投资需求，此处采用的指标与经济结构调整中使用的居民消费产出比重一致，^⑦ 当该指标上涨时表明居民消费的增加，从侧面反映了居民生活质量及福利的提升。

根据上述高质量发展指标的设定，此时地方政府面临的目标为：

$$E_t \left\{ \sum_{s=t}^{\infty} \beta_g^{s-t} \varepsilon_{g,t} \left(\varphi_1 \left(\ln \frac{y_t}{y} - \varphi_y^* \ln \frac{y_t^*}{y^*} \right) - \varphi_2 \ln \left(\frac{g_t}{y_t} \right) + \varphi_3 \ln \left(\frac{y_t}{i_t + g_{k,t}} \right) + \varphi_4 \ln \left(\frac{y_t}{n_t} \right) + \varphi_5 \ln \left(\frac{c_t}{y_t} \right) \right) \right\} \quad (19)$$

其中， φ_2 、 φ_3 、 φ_4 、 φ_5 表示地方政府效用对于政府产出比重（ $\frac{g_t}{y_t}$ ）、资本生产率（ $\frac{y_t}{i_t + g_{k,t}}$ ）、劳动生产率（ $\frac{y_t}{n_t}$ ）、居民消费产出比重（ $\frac{c_t}{y_t}$ ）波动的反应系数。^⑧

① 魏敏、李书昊 《新时代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的测度研究》，《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18 年第 11 期。
 ② 逢锦聚等 《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笔谈》，《经济学动态》2019 年第 7 期。
 ③ 高培勇等 《高质量发展背景下的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一个逻辑框架》，《经济研究》2019 年第 4 期；魏敏、李书昊 《新时代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的测度研究》，《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18 年第 11 期。
 ④ 李金昌等 《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体系探讨》，《统计研究》2019 年第 1 期。
 ⑤ 马茹等 《中国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及测度研究》，《中国软科学》2019 年第 7 期。
 ⑥ 陈诗一、陈登科 《雾霾污染、政府治理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经济研究》2018 年第 2 期；沈坤荣、傅元海：《外资技术转移与内资经济增长质量——基于中国区域面板数据的检验》，《中国工业经济》2010 年第 11 期。
 ⑦ 魏敏、李书昊 《新时代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的测度研究》，《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18 年第 11 期。
 ⑧ 此处高质量指标前的系数 φ_2 、 φ_3 、 φ_4 、 φ_5 均设为 1/5，即表示这些指标同经济增长指标一样，对政府效用的作用程度都是同样的。

(2) 模型的脉冲响应分析

图 5 展示了在传统地方政府考核机制 (case1) 和多元化地方政府考核指标机制 (case2) 情形下, 地方政府短期偏好上涨冲击对经济发展质量的动态影响, 从侧面反映了多元化地方政府考核指标在其中起到的作用。图 5 第 1 列表明, 在地方政府短期偏好上涨冲击来临初期, 多元化考核指标机制下的经济增长率上涨速度明显减缓, 这说明地方政府“唯 GDP 论”的行为得到改善。观察图 5 第 2 至 4 列可知, 对资本生产率-经济增长率、消费率及居民福利而言, 在地方政府短期偏好上涨冲击来临初期, 无论是在传统地方政府考核机制还是多元化地方政府考核指标机制下, 其作用方向均为负, 但在考核指标多元化情形下经济发展质量指标的下降程度要小得多, 由此说明多元化地方政府考核指标可以显著提升地方政府对经济效率及经济福利的重视。“作用方向依旧为负”反映了一个现实, 虽然中央政府近年来已明确提出要纠正单纯以经济增速作为评定指标的偏向, 但目前由于一些其他因素的存在, 仅仅依靠考核指标的转变还不能完全扭转当前经济效率、居民经济福利低下的现象。根据前文分析, 本文认为在地方政府考核目标转变发挥正向作用时, 营商环境的优化起到了正向作用, 但地区竞争和市场分割这些因素的存在起到了一定的抑制作用, 使得多元化地方政府考核指标对经济质量指标的优化作用不能得到很好地发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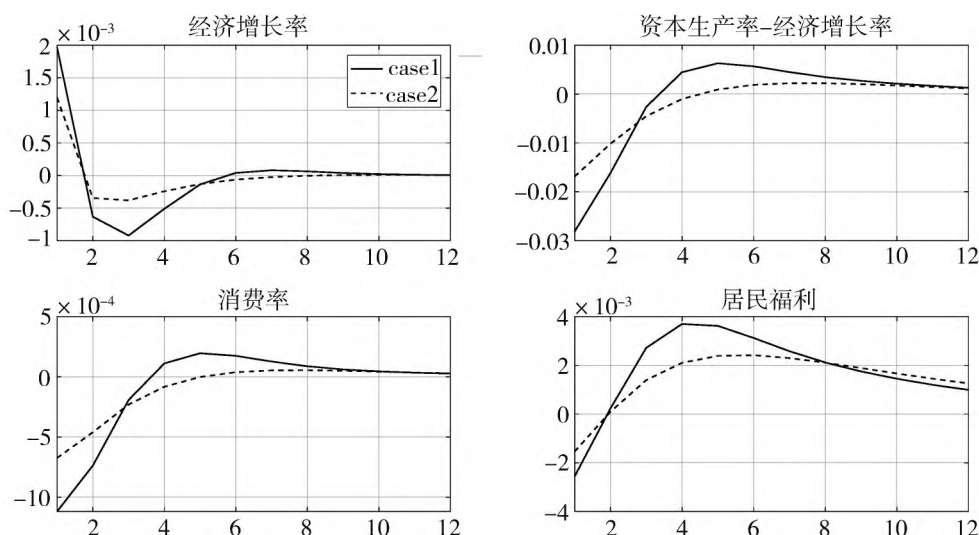


图 5 考核机制转变情形下地方政府短视冲击的脉冲响应对比图

首先是地区竞争的作用。图 6 第 1 行展示了在多元化考核指标机制下, 存在地区竞争 (case1) 与不存在地区竞争 (case2) 对经济发展质量指标的影响程度差异。结果表明, 当本地区的地方政府短期偏好受到一个标准差的正向冲击时, 无论地区竞争是否存在, 资本生产率-经济增长率、消费率、居民福利均在冲击发生的当期便下降到最小值, 随后出现陡峭的上升, 最后较为平缓的回归稳态。但当不存在地区竞争时经济效率及经济福利指标的下降程度均要小于存在地区竞争的情形, 由此可见, 虽然多元化考核指标有利于经济质量指标的优化, 但地区竞争在其中起到了明显的抑制作用。

其次是市场分割的作用。图 6 第 2 行展示了在多元化地方政府考核指标机制下, 市场完全分割 (case1) 与市场完全不分割 (case2) 对经济发展质量指标的影响程度差异。结果表明, 与地区竞争结果类似, 当本地区的地方政府短期偏好受到一个标准差的正向冲击时, 无论市场是否分割, 资本生产率-经济增长率、消费率、居民福利均在冲击发生的当期便下降到最小值, 随后出现较为陡峭的上升, 再较为平缓的回归稳态。但当市场完全不分割时经济效率及经济福利指标的下降程度要小于市场完全分割的情形。由此可见, 市场分割阻碍了地区间商品等流动, 对经济发展质量的改善也起到了明显的抑制作用。

最后是营商环境的作用。图 6 第 3 行展示了在多元化地方政府考核指标机制下, 不同营商环境对经济发展质量指标的影响程度差异。结果表明, 当本地区的地方政府短期偏好受到一个标准差的正向

冲击时，无论营商环境如何，资本生产率-经济增长率、消费率、居民福利均在冲击发生的当期便下降到最小值，随后较为陡峭的上升，再较为平缓的回归稳态。但当营商环境得到改善时，经济效率及经济福利指标虽然仍是下降趋势，但下降程度得到轻微缓解。由此可见，在多元化地方政府考核指标机制的引导下，营商环境得到优化，这有利于经济高质量发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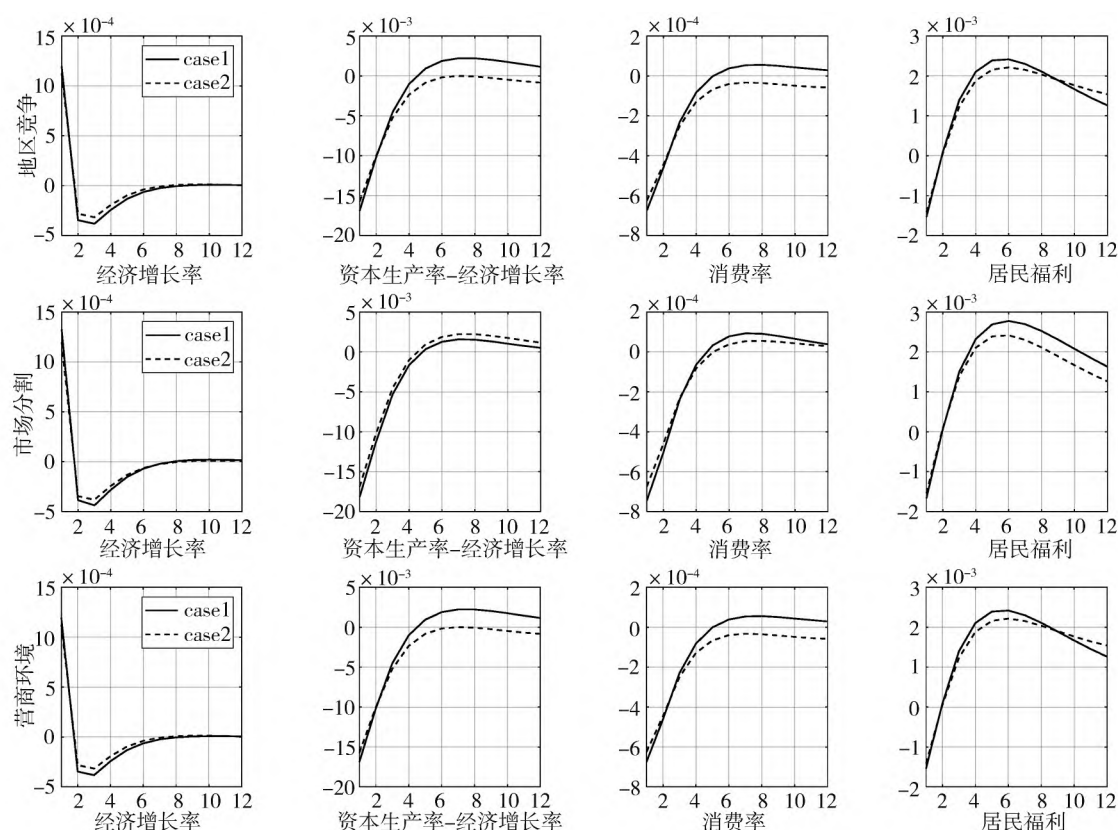


图 6 脉冲响应对比图

3. 稳健性检验

下面对部分关键参数进行稳健性检验，主要包括以下两类参数：地方政府短期偏好 φ_y 及地方政府面临的多元化目标方程（18）中的各类指标占比 φ_1 、 φ_2 、 φ_3 、 φ_4 、 φ_5 ，这两类参数无法通过已有文献或者数据进行准确识别，为分析定量结果是否准确，本文通过调整这些参数的取值来确定其对脉冲结果的影响。图 7 和图 8 分别报告了在调整地方政府短期偏好及多元化地方政府考核指标占比时的定量结果。可以发现，两类参数调整后的结果均与前文相似。这表明本文的研究结果在各种参数取值下是稳健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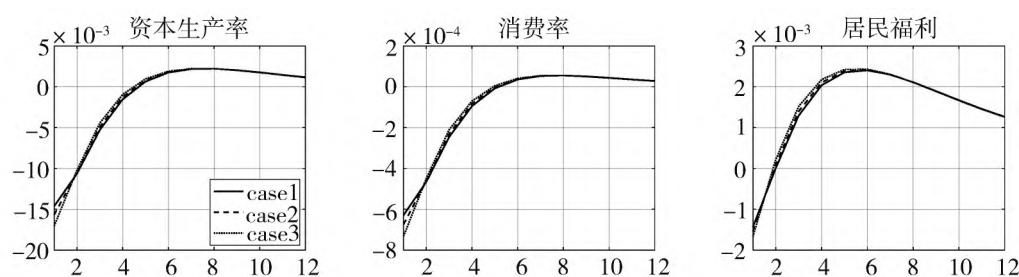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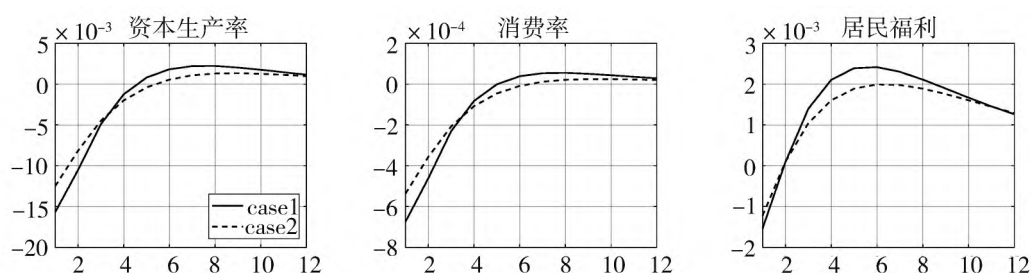


图 7 不同 φ_y 值下的脉冲响应对比图^①

① 图 7 中 case1、case2、case3 分别为 $\varphi_y = 3$ 、 $\varphi_y = 2$ 、 $\varphi_y = 1$ 情形下地方政府短期偏好冲击对经济发展质量的结果。

图 8 不同考核指标占比较下的脉冲响应对比图^①

五、总结和政策建议

(一) 主要结论

长期以来，GDP 增长率作为地方政府考核体系内关键甚至是唯一的指标，无疑推动了地区经济增长，但也引发了一系列制约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问题。随着中央政府愈发重视经济发展质量，对地方政府考核体系也进行了调整。在此背景下，本文着重考察了两方面问题：第一，地方政府考核指标的转变是否会对经济发展质量产生影响。第二，在该影响的过程中地区竞争、市场分割及营商环境这些因素又产生了怎样的作用。为此，本文利用省级面板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发现地方政府考核目标的转变确实会对经济发展质量产生影响。为进一步研究其中的作用机制，本文通过构建一个包含地区竞争、市场分割及营商环境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讨论了地方政府考核目标转变与经济发展质量的关系。实证发现：第一，在传统地方政府考核指标下，短期目标导向冲击对经济发展质量存在一定抑制作用，地区竞争、市场分割以及营商环境是重要传导渠道。第二，在多元化地方政府考核指标机制下，经济效率、经济福利两类经济发展指标的下降程度要低于传统地方政府考核机制情形；营商环境的优化有利于经济高质量发展，但由于地区竞争和市场分割的存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考核目标转变所带来的正向作用。

(二) 政策建议

第一，优化地方政府考核机制，引导地方政府更加重视多元化经济发展指标，充分发挥政治激励的正向作用，降低由考核指标不合理引致的经济发展质量损失。在设计地方政府考核指标时，应纳入经济高质量发展理念，全面且综合考察地方政府能力，防止“为增长而竞争”的情形，确保地方政府决策是在经济高质量发展目标下进行的，同时引导地方政府优化营商环境，促进经济效率及经济福利的提升，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第二，推动地区间经济合作，将地区竞争转向良性竞争，实现地区间共赢，缓解资源空间配置扭曲，维持中国经济平稳健康的发展。第三，统一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经济目标，逐步消除市场分割，打破市场壁垒，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促进发挥企业集聚效应，提高企业生产效率，畅通国内大循环。

(责任编辑：吴 茜)

① 图 8 中 case1、case2 分别为考核指标占比相同和考核指标占比不同情形下地方政府短期偏好冲击对经济发展质量的结果。

improve the organizational resilience of public sectors to deal with risks. This study introduces the “time variable” and proposes an analytical framework of “emergency transition” for grassroots resilient governanc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olicy feedback. Public policy is not only the result of the political process, but also affects the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and preferences of target groups, thereby reshaping the political environment. According to the significance and urgency of the problem, the authors of this study distinguish routine issues and urgent issues, and analyze two organizational modes of grassroots resilient governance, namely the rule-led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and the authority-led integrative governance. The risk of routine issues is low and the time pressure for problem resolution is small. Under the guidance of rules, various actors cooperate through negotiation based on trust and commitment to reach consensus. Faced with urgent issues, collective action relies on authoritative cross-boundary mobilization to complete tasks within the specified time. The two governance modes have different application scenarios, and decision-makers need to flexibly promote “emergency transition” according to the nature of tasks and policy feedback effects.

Based on the case study of property management reform in District S of Beijing municipality, it is found that in urgent scenarios, the public sector deeply intervenes in property affairs, establishes task force and property management committees, which improves the ability to handle intractable problems. As the problem tends to ease, the public sector adjusts its attention allocation, reduces direct intervention, and flexibly resolves disputes by setting up deliberative platform to promote the transition from emergent scenario property management to regular property services. Under the condition of limited resource, resilient governance means that policymakers need to distinguish the urgency of public affairs, collect feedback information on policy implementation, grasp the adjustment opportunity, and flexibly converse between integrative governance and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Emergency transition” is an important means for public sector to respond to environmental disturbances, resolve urgent problems, and improve organizational resilience. Its effective operation relies on the joint support of attention distribution mechanism, discourse construction mechanism, and feedback learning mechanism.

The basic conclusion of this study is that there is no single optimal model for public affairs governance. Decision makers need to assess the change of the problem based on the feedback effect of policy intervention, and steadily promote dynamic conversion of governance to avoid the risks brought by “sudden” or “hysteretic” transition. “Emergency transition” has distinct pragmatic characteristics, and decision makers adopt flexible strategies, which is conducive to achieving the unity of order and vitality, thereby enhancing the agility, flexibility and adaptability of hierarchical system.

Key words: Resilient governance; Policy feedback; Emergency transition; Grassroots governance

A Study on How the Change in Assessment Objectives of Local Governments Impact Economic Efficiency and Welfare

Wang Wenfu, Fang Ye

Summary: With China's economy having shifted from a stage of high-speed growth to a stage of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it is urgent to guide local governments to direct their attention to the qualit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are problems to be solved with a reasonable and scientific assessment system.

This paper first uses the provincial panel data of 30 provinces in the Chinese mainland except Tibet from 2007 to 2017 to conduct an empirical study. The empirical results show that the change in assessment

mechanism does impact the qualit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To further study the mechanism of action, this paper expands on the new open macroeconomic model, and a dynamic stochastic general equilibrium model (DSGE) including regional competition, market segmentation, and business environment is constructed to investigate the impact of the change of assessment objectives on the qualit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 numerical simulation results of the model show that, firstly, the traditional assessment mechanism will hinder the improvement of economic efficiency and economic welfare, the greater the degree of regional competition, the more complete the market segmentation; and the lower the degree of effort to optimize the business environment, the more obvious the hindrance effect will be. Second, under the diversified assessment mechanism, the short-term goal orientation of local governments can alleviate the negative impact on the qualit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Among them, optimizing the business environment is conducive to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the economy. However, due to regional competition and market segmentation, the mitigating effect cannot be well released.

In the stage of continuous promotion of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 diversified assessment mechanism should be implemented as soon as possible to give full play to the positive role of political incentives. Inter-regional cooperation should be promoted to turn regional competition into healthy competition, and achieve regional win-win. Local governments should be guided to optimize the business environment, eliminate market segmentation, break down market barriers, and promote economic efficiency and economic welfare.

The innovation and contribution of this article are mainly reflected in the following two aspects: Firstly, in terms of research content. This article discusses the impact of changing assessment objectives on the qualit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within a unified theoretical framework. It verifies that factors such as regional competition, market segmentation, and business environment are important transmission mechanisms. Secondly, in terms of research methods, it incorporates diversified assessment objectives into the general equilibrium model, and uses the Ramsey algorithm to optimize the behavior of local governments. This is a beneficial attempt to improve the construction of a multi-level government model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d it can be used to simulate performance evaluation reform and provide a certain theoretical reference value for policymakers.

Key words: Change of assessment objectives; Regional competition; Market segmentation; Business environment; Economic efficiency and welfare

How to Understand Husserl: The Origin, Turn and Breakthrough of His Problematics

Ma Yinghui

Summary: We must follow Husserl's own train of thinking to understand Husserl. When Husserl extended the sensible intuition to the categorical intuition in *Logic Investigations*, he missed the self-givenness and the given being as the precondition of intuition, because he didn't explain in advanc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ways of self-manifestation" and sensibility and category. This problem became the starting point of Husserl transcendental breakthrough. Between 1907 and 1910, Husserl not only began to focus on the idea of absolute givenness and the *a priori* in it, but also in his study of inner time-consciousness in the same period succeeded in characterizing the inner structure of absolute given being through uncovering the synthetic mode of retention, i. e. the revelation of the double intentionality of retention, which laid a new intentional